

“祠沙”、“放彩船”考释

——兼论对明清闽台王醮仪式之影响

◎ 姜守诚

【摘要】“祠沙”和“放彩船”是北宋及元明时期一度盛传的两种禳灾祭海活动，素为南方沿海民众所信奉和传承。这两种仪式都是通过将特制小船漂流入海的方式来表达核心理念：祭祀海神，祈求佑护和禳灾却害，从而实现人船平安的美好愿望。本文着眼于传世文献，对“祠沙”、“放彩船”的历史渊源及传承地域等情况作了梳理和分析，并指出明清以降闽台地区流行的王醮（“请相出海”）仪式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关键词】祠沙；放彩船；王醮仪式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2-0092-4

“祠沙”和“放彩船”是北宋及元明时期南方沿海一带民众中盛传的禳祭活动。这两种仪式有着一些共通的特征：其一、祭海，藉此表达对海神或溺水亡魂的敬畏和祭奠；其二、放彩船，藉此禳灾却害、祈求航路平安。若就核心理念而言，明末以降闽台地区兴起的王醮仪式则与二者有着几分相似性。下面，结合文献分别对上述几种宗教民俗活动进行简要地梳理和讨论。

一、“祠沙”：北宋浙江沿海一带船员的祭海习俗

北宋徐兢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

“沈家门”条云：“（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丁丑辰刻，四山雾合，西风作，张篷，委蛇曲折，随风之势，其行甚迟，舟人谓之抅风。巳刻，雾散。出浮稀头、白峯、窄额门、石师颜，而后至沈家门抛泊。其门山与蛟门相类而四山环拥，对开两门，其势连亘，尚属昌国县。其上渔人樵客丛居十数家，就其中以大姓名之。申刻，风雨晦冥，雷电雨雹欻至，移时乃止。是夜，就山张幕，扫地而祭，舟人谓之祠沙。实岳渎主治之神，而配食之位甚多。每舟各刻木为小舟，载佛经、糗粮，书所载人名氏，纳于其中，而投诸海，盖禳厌之术一端耳。”^{〔1〕}文中所言“沈

〔作者简介〕姜守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家门”乃系位于舟山本岛的东南部,今为浙江舟山市普陀区治。这段文字介绍了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路允迪及徐兢等人奉命乘坐“神舟”出使高丽,当船队途经沈家门时遭遇雷雨风浪,船员就地举行“祠沙”祭海仪式:当天夜晚,船员们因地制宜、清扫场地,张设帷幕、搭建坛场,祭祀执掌各大山川的神祇,兼设配享之神众多。每船均刻木质小船一艘,其内装载佛经、粮食及随船人员名单,将小船投入海中漂流而去。

无独有偶,该书同卷“黄水洋”条又云:“黄水洋,即沙尾也,其水浑浊且浅。舟人云:其沙自西南而来,横于洋中千余里,即黄河入海之处。舟行至此,则以鸡黍祀沙,盖前后行舟,遇沙多有被害者,故祭其溺水之魂云。”^[2]文中“黄水洋”系指长江口以北至今海洲湾一带,即今属黄海海域。这一带海域因水中泥沙过多而呈黄色,潮流湍急,海底深浅不一、暗礁众多,故常有往来船舶在此遇险。有鉴于此,古代船员航行至此皆心怀畏惧,遂有“祀沙”之惯例:备下丰富的饭菜,祭祀先亡溺水之魂,并祈祷水路平安。^①换言之,与前次涂径“沈家门”时突遇风浪而临时施予“祠沙”禳祭有所不同,此次则为凡至“黄水洋”均会惯例式举行“祀沙”仪式。不过遗憾的是,文中并未介绍后次“祀沙”时是否也施放木刻小船?

分析上述引文可知,北宋时人所言“祠沙”(“祀沙”)仪式当系随船人员遵循了他们家乡的当地习俗而举行的祭海仪式。关于船队舟人之籍贯,《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并未言及。但据我们推断,似乎可判定以浙江籍人士为主。这是因为,宋

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奉命出使高丽的船队共计八艘船(“神舟”二艘、“客舟”六艘),均从明州府(今宁波)定海县(今镇海区)招宝山港口启航。^②明州地处东海之滨,是古代海外交通的主要港口。北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朝廷下旨,明州取代登州成为高丽、日本等国使臣及商人往返中原的唯一合法港口。^③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繁荣,当地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舟人(职业船员)。明初郑和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就是从宁波港出发,随行船员中也以宁波人居多。故而我们推断北宋出使高丽的徐氏船队中以明州或浙籍舟人为主,似无大谬。进而言之,“祠沙”(“祀沙”)当系北宋浙江沿海一带渔民中相承沿袭的祭海风俗。其实,舟山、深圳等沿海城市迄今仍保留了“辞沙”祭海之民俗活动,不过内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放彩船”:元明时期越南及广东等地民众的攘灾传统

前引《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谈到“祠沙”仪式将木质小船“投诸海”时,仅笼统地说“盖禳厌之术一端耳”。元代汪大渊(公元1311~?年)撰《岛夷志略》“灵山”条则进一步解释此举乃系“以攘本舶之灾”,如云:“舶至其所,则舶人斋沐三日。其什事,崇佛讽经,燃水灯,放彩船,以攘本舶之灾,始度其下。”^[3]据学界考证,灵山乃位于越南中部最东端的华列拉岬(Cape Varella),系为今越南富庆省槟榔湾达约港。^④由此可知,至迟元代时,放彩船以攘灾之举在地处南中国海的越南灵山等地就已十分盛行。那么,此时中国是否亦同样有

① 引文“以鸡黍祀沙”之句是指准备丰盛的饭菜、祭祀流沙。“鸡黍”一词,见于《论语·微子》:“丈人止于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

② 详见(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神舟”、“客舟”、“招宝山”条。(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三编(八),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131页)

③ 据《宋史·列传·外国三·高丽》记载:“往时高丽人往反皆自登州,(熙宁)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涂由明州诣阙,从之。”(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046页)

④ 有关“灵山”之准确地理位置,中外学者多有讨论,今采苏继颀、谢方等人之说法。(详见元·汪大渊著、苏继颀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224~226页;明·张燮:《东西洋考·附录:地名今释》,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1页)

此民俗呢? 元代顾瑛(公元1310~1369年)辑《草堂雅集》(卷十六)收录释良琦撰《归西山道中有懷自诚水西二友二首》诗云:“柳暗江深积雨晴,知君独放彩船行。归心自为青山动,客思都从芳草生。”^[4] 引文中“知君独放彩船行”之句语焉不详,我们尚无法据此判定其含义是否为禳灾,故存而不论。

有关灵山“放彩船”之记载,亦见于明人所著《星槎胜览》和《东西洋考》等史籍中。明代张燮(公元1574~1640年)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所撰《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西洋针路》“灵山”条引明人费信《星槎胜览》曰:“与占城山连接,峻岭而方,有泉下绕如带。山顶一石块似佛头,故名灵山。往来贩舶于此樵汲,崇佛诵经,燃放水灯彩船,以攘人船之灾。”^① 同卷《舟师考·祭祀》又云:“灵山石佛,头舟过者,必放彩船和歌,以祈神祝。”^[5]

值得注意的是,张燮撰《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西洋针路》“乌猪山”条:“上有都公庙,舶过海中,具仪遥拜,请其神祀之。回用彩船送神。”^[6] 文中所言“乌猪山,又名乌猪门,今我国广东省广海湾外上川岛东南之乌猪洲。”^[7] 随后,《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祭祀》对这位“都公”神给予介绍:“都公者,相传为华人,从郑中贵抵海外归,卒于南亭门。后为水神,庙食其地。舟过南亭必遥请其神,祀之舟中。至舶归,遥送之去。”^[8] 这两段引文介绍了明朝乌猪山(今广东台山市川山群岛上川岛东面的乌猪洲)祀“都公”风俗:凡途经此地的船舶均会遥拜岛上的都公庙、迎请水神“都公”上船供祀,完毕后用彩船送神离去。这里言及彩

船送神,与前引灵山放彩船以禳灾之做法有所不同,当兼有驱邪避灾和隆重礼遇等含义。明代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条谈到当地人结婚时亲朋邻里以“装插彩船”作为贺喜之礼,其用意当与此类似,如谓:“其婚姻之礼……亲朋邻里以槟榔、荖叶、线纫草花之类,装插彩船而伴送之,以为贺喜之礼。”^[9]

此外,明钞本海道针经《顺风相送》^[10]亦多次谈到“放彩船”,譬如“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条谈道:“乌猪山……请都公上船往回放彩船送者”^[11],“灵山大佛……山有香炉礁,往回送彩船。”^[12] 又“歌”条曰:“灵山大佛常挂云,打锣打鼓放彩船。”^[13] 总之,上述文献均证实了明代灵山及乌猪山等地民众乃盛行送彩船之风俗。

三、明清之季“王醮”仪式的理论来源

王醮实为“瘟醮”,世人避忌“瘟”字不雅、故隐喻称之为“王醮”或“王船醮”、“王爷醮”、“迎王祭”等。明清之季闽台地区十分盛行这种宗教民俗活动,其含义就是将代表瘟疫和灾厄的瘟神(王爷)迎请来祭祀礼遇一番后,再将其连同交通工具“王船”一起送离出境——通常在特定地点(多择湖边、海滩等水流处)予以焚烧或泛水,藉此象征送走了瘟疫灾厄、求得一方平安,故世人又称之为“送王船”。有关闽台地区王醮仪式之理论来源,我们已撰文讨论过。^③ 这里再对“祠沙”和“放彩船”两种习俗对其形成之影响略作补充说明。

明清以降,闽台地区盛行的王醮仪式当与古

①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第174页。此外,明代陆楫编《古今说海·说选部》引《星槎胜览》卷一“灵山”条云:“其处与占城山地连接,其山峻岭而方,有泉下绕如带,山顶有一石块似佛头,故名灵山。民居星散,结网为业,田肥,耕种一岁二收。气候之节,男女之礼,与占城国大同小异。地产黑文相对藤杖,每条易斗锡一块,若粗大而纹疎者,一锡易杖三条。次有·椰葵叶,余无异物。往来贩舶必于此樵汲,舶人斋沐三日,崇佛诵经,燃放水灯彩船,以攘人船之灾。”(明·陆楫等辑:《古今说海》“说选癸集”,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202~203页)

② 《顺风相送》明钞本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据学者考证认为此书系撰于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

③ 详见拙作《“祀瘟神”与“送瘟船”——中国古代瘟疫醮之缘起》,待刊;《传承与衍变——从明代<武陵竞渡略>检视闽台“送王船”习俗的历史传统》,待刊。

老的龙舟竞渡及“厉祭”传统有着直接关联,两宋时期江淮及两湖流域民众中流行的“祀瘟神”与“送瘟船”习俗则可视为其雏形。此外,北宋明州籍(或浙江沿海一带)船员中沿袭的“祠沙”祭海习俗,明代广东乌猪洲及越南灵山等地“放彩船”传统,均对明末“王醮”之形成起到了一些影响作用。其实,上述宗教民俗活动,均基于禳灾祛瘟的核心理念,其外在表现形式也都借助了舟船来完成。换言之,这些仪式均同时兼备如下几种基本要素:水(江河或湖海),船(木船或纸船),瘟疫或灾厄。

耐人寻味的是,迄今台湾屏东县东港镇民众在三年一科的王醮祭典活动中仍保留一项传统:

焚送王船的前一天会举行“迁船”绕境仪式,其旨在收瘟与祈安。境内民众以家庭为单位、按照丁口人数提前预备好纸人替身(并书写姓名、籍贯及生辰等)。待王船经过时,家长执纸人在每位家人身上比划(次数以年龄为据),之后将纸人送到东隆宫前,翌日随同王船一起焚烧,藉此送走瘟疫和灾厄。这一做法,乃与北宋时人“祠沙”如出一辙,也与明代“放彩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王醮仪式乃系融合了不同异质文化的产物。事实上,闽台沿海一带既是中原文化南移的重心,同时也是较先接受海外文化影响的区域。故而说,“送王船”(王醮)仪式在此地应运而生,并长期得以盛行,亦在情理之中。

【参考文献】

- [1]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三编(八)[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32.
- [2]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载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三编(八),134.
- [3] (元)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1.223.
- [4] (元)顾瑛辑.杨镰、祁学明、张颐青整理.草堂雅集:卷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8.244.
- [5] [6] [8]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M].186,172,186.
- [7] (明)张燮:《东西洋考·附录:地名今释》,谢方点校[M].第282页.
- [9] (明)马欢原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24~25页.
- [10] [11] [12]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0.33,34,47.

(责任编辑 李远国)